

Niccolò Machiavelli

Le Istorie Fiorentine

马基雅维利全集 | 02

佛罗伦萨史

王永忠 译



马基雅维利全集
佛罗伦萨史

王永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利全集. 佛罗伦萨史 / (意)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N.) 著; 王永忠译. — 长春: 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0
ISBN 978-7-5534-3144-4

I. ①马…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马基雅维利,
N. (1469 ~ 1527) — 全集 ②佛罗伦萨共和国 — 历史 IV.
①C52 ②K5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826号

马基雅维利全集：佛罗伦萨史

作 者 [意]马基雅维利
译 者 王永忠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聂文聪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9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3144-4 定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Niccolò Machiavelli

Le Istorie Fiorentine

根据 1851 年佛罗伦萨 Felice le Monnier 第 3 版，
并参照多种法译本和英译本译出。

学术顾问

潘汉典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法学家

何兆武

清华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历史学家

徐大同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资深政治学家

王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深翻译家

田时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意大利语翻译家

周春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基雅维利研究专家

编译委员会

薛 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永忠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徐卫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段保良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刘训练（统筹）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出版说明

恩格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自然辩证法·导言》）。仅在意大利，就产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这样的文学巨匠，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艺术大师，而马基雅维利则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最杰出的代表。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喜剧作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简称《李维史论》或《论李维》）、《用兵之道》（又译《战争的艺术》、《兵法》）、《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此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剧作、出使通讯、政务札记和私人书信等。

《马基雅维利全集》的意大利文版本比较复杂，收入的内容也有少量出入。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采用比较权威、比较容易获得的1843年佛罗伦萨版（*Opere complet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con molte correzione e giunte rinvenute sui manoscritti originali*, Firenze: Alcide Parenti, 1843）为底本，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由译者自行选择、参照更为权威或方便的版本或英译本译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Machiavelli”，国内还有“马基雅维里”、“马基雅弗利”等译名，这里我们统一为“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的中译名也不尽相同，但并无实质性分歧，为了尊重各卷译者的意愿，我们没有强求统一；对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比如Virtù）的译法，学术界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也没有强求统一；其他常见专有译名，我们则尽量作了统一。

导 言

哈维·曼斯菲尔德

在这部译作中，我们将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的书名翻译为 *Florentine Histories*，而不是更为常见但也更不准确的 *History of Florence*。这一选择同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忠实原文的倾向是一致的，但这也显示了一个特殊的疑问，即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是否在写一部如我们通常所知的“历史”？

马基雅维利的这部著作同当今的一部历史书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它选择了一个叙述对象：佛罗伦萨；它描述了一个特定时期：从佛罗伦萨城的起源直至1492年洛伦佐·德·梅迪奇的去世；并且，它呈现了一个问题或主题，即佛罗伦萨内部引人注目的仇恨与党争的起因。然而，这并非一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意义上的佛罗伦萨史，它要求佛罗伦萨具有或已经具有一种历史。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指涉一个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历史”（*istoria*）一词的。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历史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本身；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历史显然是不同于历史本身的某种东西。因

* 译自 *Florentin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Laura F. Banfield and Harvey C. Mansfield, J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而，当他说“我们的历史”或“我的这部历史”的时候，他指的是一种研究或一种探究，他也称之为“我的叙述”或“我的描述”或“我的事业”（参见献辞）。并且，由于他在头脑中并未将历史看成一个对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复数意义上说“佛罗伦萨史”（Florentine histories）——与今天我们用法相反，今天的用法承认撰写过许多部佛罗伦萨史，但否认佛罗伦萨拥有不止一种历史。进一步地与当今的做法相反，马基雅维利不是在谈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对他而言，历史就是历史编纂。

因而，马基雅维利对“历史”一词的使用足够引起我们怀疑，《佛罗伦萨史》是否是如我们所知的历史？但是，我们所知的历史也许永远都不会让我们有其他的设想。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在作为一个对象以及一项研究的意义上，历史把马基雅维利包含在一种语境之中，这种语境不能不同我们的语境以及我们的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他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事实，那些事实影响过他的历史书写，也包括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编纂风格，连同支撑着那些历史编纂方法的历史观念。

从后者开始讲起，我们发现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的历史学家（以及编年史学家）都在他们的历史著作前冠以复数形式的历史（histories），首先是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佛罗伦萨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历史体现了某些在今天的历史著作中不会出现的特点：将历史分成若干卷，并冠以一般性的、非历史的引言绪论；虚构了现场发表的演讲，仿佛它们是逐字逐句或原封不动地被记录下来的；而且突出再现了一部政治史，忽视了经济、文化、社会和智慧的历史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暗示政治史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历史。马基雅维利采取这些人文主义历史编纂惯用的手法表明，他的历史观念、甚至历史语境都有别于我们。

在序言中，马基雅维利说他这部著作的目的是“写一部佛罗伦萨人在国内外（或内政外交）的历史”。在本书第一卷中，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说，

他叙述的是“自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1434年发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他展现了意大利从蛮族入侵一直到1434年“不同的君主在不同时代是以何种方式统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起源在蛮族入侵之前，从书中第二卷第2节中我们知道，其时正值罗马共和国解体；然而，我们会说——并且马基雅维利似乎也是这个意思——他的第一卷将佛罗伦萨置于“情境之中”。困难在于，他将此情境称为“我们普遍的论述”（第二卷第2节）。尽管第一卷看起来仅仅是对发生在意大利的诸多事件的一个叙述，马基雅维利赋予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历史范畴。另外，以下七卷的每一卷都是以讨论某个非历史的一般性主题展开的：殖民地、平民与贵族之间天然形成的对立、自由与放肆、治乱的自然循环、战争胜利的好处、有“派系”的纷争和无“派系”的纷争之间的区别，以及阴谋。诚然，马基雅维利非常典型地以一种看似历史的方式在各个方面比较了古人与今人，但是他此举是为了解释古人德行的出类拔萃，而非仅仅引出一种历史语境下的差异。

在他宽广的世界观中，以及在他对城邦的兴衰和城邦内部纷争的关注中，马基雅维利注意到了“历史变化”的事实，正如我们会说的那样。但是，他对其解释却大异其趣。对他而言，历史变化要么是自然的运动，也许并非随机的，但也并非按人意所愿的；要么是人意所愿的命令和安排（“秩序和模式” [orders and modes]，见序言和第八卷第29节）。由于自然的运动不能使人感到安全或愉快，它们对人而言是“命运”，时好时坏，然而永远都不可靠；因为自然在我们看起来就像命运，事实上，它被简化为命运。哲学家首先辨明了恒常不变的自然和变化无常的命运，与此种古典的对立观点不同，马基雅维利在此问题上采用了普遍的态度，他认为无论自然还是命运都是不可信的。因为通过人类德行(human virtue)所创造的人类秩序是用来克服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并用来建立可靠的准则和状态的，所以，历史的语境必须被理解为德行和命运之间的一种竞争。或许在某个历史时刻，德行确定无疑地赢得了这种竞争；但是，由于它解释历

史，这种竞争本身不是历史的，并且不会由历史来决定。如果德行和命运之间的竞争就是历史语境的话，那么，历史的语境就不是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这个词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意味着一项研究或探究，而不是指作为一个对象的历史。

为了自夸其历史著作的价值，马基雅维利在序言中做出了一个声明；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历史的，但却符合人文主义历史编纂的做法。“共和国任何发生变化的事例”，他说，“对于那些阅读自身历史的人而言，变化越大，越有益处。没有任何其他共和国遭受的党争状况比佛罗伦萨更显而易见”。他为他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和理论的归纳，任何一个都与我们所关心的历史问题毫不相似。对我们而言，一位历史学家被认为是超越“一个人自身”的关切，并且不会容忍选择一个对他自己国家有利的课题。然而，他也并不只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以至于相信他的主题仅仅是某种普遍范畴的一个“范例”，对于它的选择必须通过一个理论兴趣（比如，共和国）加以合理辩护。如果佛罗伦萨仅仅是共和国的一个范例的话，那么，就很难在《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利另外两部更为理论化的著作《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即在历史与政治科学——之间找到一条界线。确实，《佛罗伦萨史》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像一本政治科学著作所要求的那样关注所有的共和国与君主国。但是，《李维史论》主要关注的也是一个共和国（罗马），《君主论》则主要是关于君主国的。更重要的是，读者不久就会发现，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袖常常被马基雅维利称为“君主”，它也一度被称为君主国（第一卷第26节），其典章制度、行为举止与君主国更有诸多相似之处。难怪许多学者尝试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寻找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在书中各卷的开篇语当中以及贯穿始终的精辟论断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不难发现。在第八卷第1节中，马基雅维利让他的读者去参考《李维史论》中关于阴谋的一个更为详细的讨论，而不是更为抽象或科学的讨论。

因此，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史》的作者，同那些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有两个不同但并非排他的动机——实际的和理论的——其中第一个动机对我们而言似乎隐匿于历史之下，而第二个动机则浮现其上。从历史的这个双重动机来看，可以推断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关注。今天的历史学家有理由怀疑政治能够解释所有的人类活动，而将注意力从政治史转向建立和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和智识的历史。对于历史作为一个对象而存在的观点非常有信心，如果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他们就期待建构另一种历史。但是，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历史并不是一个对象；相反，历史的对象就是德行同自然或命运之间的竞争。超出政治史之外或隐匿其下，就等于离开了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武器”做些什么的领域，而进入自然或命运的领域，在那里我们看来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维利可能会想从现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知道，社会、经济、文化和智识的历史是否能够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也就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他想知道其他各种形式的历史，通过被提升到我们的意识范畴或被降格到我们力所能及的理解范围之内，是否也能够成为政治史。

在《佛罗伦萨史》中，与其说马基雅维利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历史，不如说他将其政治化了。在那些可能成为社会史的叙述中，他关注到了“平民”中不同阶层的区分，还叙述了行会的兴起(第二卷)以及庶民的反叛(第三卷)，然而始终是为了考察它们的政治后果。对于经济史，他讨论了沃尔泰拉开采一个明矾矿成为战争的起因(第七卷第29节)，以及在热那亚开办的圣焦尔焦银行的运作，并将其看做是腐败丛生的社会中自由政府的一个例子(第八卷第29节)。为了与文化同步，他提到了“最杰出”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第四卷第23节)，但随后又叙述了他在围攻卢卡城时进行的一次实验，结果事与愿违，佛罗伦萨军队自身受到了威胁(还可参见第七卷第4节中他关于建造皮蒂宫的政治评论)。书中还提到了马尔西利奥·费奇

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以及其他一些人接受过梅迪奇家族的资助(第七卷第6节,第八卷第36节)。但丁作为历史学家叙述了佛罗伦萨城的起源以及该城党争的起因(第二卷第2节),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号召平民拿起武器(第二卷第18节),并作为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流亡者之一(第二卷第24节)——至于是否公正,马基雅维利没有交代。多纳托·阿奇阿尤利,“此人精通希腊、拉丁文学”,仅在一个地方作为佛罗伦萨人的使节被提及(第八卷第14节)。

除了他的著作到底是历史还是政治科学尚无定论,以及对政治的关注之外,马基雅维利还同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使用了虚构演说的手法。尽管他并不在现场而且也不可能在现场,他却借助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了恰如其分的话语,仿佛他们都是他一手导演的一出历史剧中的角色。在“我的这部历史”——他是这样称呼其著作的——中,他甚至提供了一些别人闻所未闻的“个人推理”(献辞)。有时,他以“大意如此”这样的套路介绍演讲,通常连这样的交代也没有。有时,演讲是间接引用的,有时则是直接引用的,仿佛这些就是准确的原文复述。马基雅维利表现得如此随心所欲,似乎蔑视了历史学家身上应当承担的那种责任,即尊重历史事实并使历史远离与之毗邻的诗歌和修辞。但是,马基雅维利在他使用虚构演说的时候远不是漫不经心或疏忽健忘的,这个技巧似乎成为了他的主旨或关注之一。从某人“口中说出”这个短语,尽管在《佛罗伦萨史》中并未出现,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李维史论》中,他大约十二次提到了李维在叙述让某人说什么话或让某人做什么事的那些例子。他在历史学家李维那里所发现的这个做法似乎很难同诗人维吉尔的做法区别开,按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17章)中的说法,维吉尔“借狄多之口说出”值得注意的事情。

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还是对他自己的“历史的尊严和真实性”感到非常自豪(献辞),就如同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们一样,都公开地声明说出了

真理。因此，最好这样去推断，马基雅维利和人文主义者持有的历史真实性(the truth of history)观念并没有赋予历史事实以绝对性。在他们看来，事实需要填充一些观点，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在缺乏文字资料和历史见证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历史的真实，他必须推测出人的意图，并通过演讲清晰地将该意图表现出来，为活动添加意义。一旦那些演讲已经被记录下来，他甚至可以为了它们自身的益处，不得不改动它们。因此，在人文主义者(以及古典主义者)的观念中，历史真实不仅与爱国主义和修辞相得益彰，而且本身就需要它们。历史真实不是简单地不同于历史学家今天称之为“神话”的东西，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神话相辅相成；因为任何人，即使是历史学家，都有一个祖国(patria)，因为所有事实都需要用言语加以解释，以获得意义。为了真实，历史学家可以——或者必须——对他所叙述的活动进行评判。但是，如果他的评判要服务于一个实际的目的，并且要为他所针对的读者接受，它必定看起来是爱国主义的。以历史事实的绝对性来评价，这种观念在今天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中是不能允许的，更不用说鼓励了。但是，在将这种历史真实观念斥责为古怪和原始的之前，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会遭遇——或者说成功避免了——历史应该是爱国主义的和解释性的要求。

在主流的论述形式之外，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的一些事实——对他的写作产生压力和影响的政权——是其历史语境的另一个因素。这些事实会聚到一个焦点上，那就是马基雅维利同梅迪奇家族的关系，这是在他写作《佛罗伦萨史》期间统治佛罗伦萨的家族。马基雅维利是在1520年11月8日应枢机主教朱利奥·德·梅迪奇之邀，接受委任撰写这部著作的；而在该书完成的时候，朱利奥已经被选立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马基雅维利在1525年5月将八卷本的《佛罗伦萨史》呈现给教皇时(从献辞的第二句话来看，他可能还希望写更多的内容)，他既在向他城市的世俗统治者又在向教会的统治者致以敬意。在他的献辞中，他介绍自己是一位谦卑的仆

人，马基雅维利承认，当一个人接受委托写作时，确有阿谀奉承之嫌。然而，他自豪地宣称他的“历史的尊严和真实性”。他在献辞的一开始说他是被委任这项工作的，但在结束时却称其为“我的事业”；而在接下来的序言中，他非常坚定地称：当“我最初下定决心写……”时，我“计划……”。然后，接受了那项任务，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主意，他着手呈现他的那部以“公元1434年”为中心的历史轮廓，那一年，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城取得了最高权力。马基雅维利绝非对他在其著作中选择的这个关节点的历史语境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了解这个语境。事实上，浏览他的全部著作可以让人这么说，《佛罗伦萨史》是他最身临其境的一部著作；在其中，他将那些强烈影响着他的势力变成了他思考的对象，而他对那些势力既无法置身其外，也无意趋炎附势。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佛罗伦萨史》——与《君主论》及《李维史论》不同——对于政治学的创新和建立贡献甚微，并且没有思考“新君主”或“新的模式与秩序”；这些分别是那两部著作的主旨，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在那两部著作中倾注了他所知晓的一切。与此对照，在《佛罗伦萨史》中，他说他竭尽全力让每个人都满意，而且“不违事实”。

马基雅维利留存下来的信件中有两封信包含了有关《佛罗伦萨史》的一些评论，而另外一个评论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年轻友人多纳托·詹诺蒂(Donato Giannotti)记录下来的。所有这三份文件都表明他对自己所处语境的关注，并暗示他是如何应对的。在他于1521年5月19日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中，他说：

有关《佛罗伦萨史》以及木屐共和国^①，我并不认为我来到这里

① “木屐共和国”(republic of wooden sandals)指天主教托钵修会方济各会的组织。1521年5月，被重新起用的马基雅维利受命出使卡尔皮，参加方济各会举行的一个会议。详见毛里齐奥·维罗利：《尼科洛的微笑：马基雅维利传》，第19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译注

损失了什么，因为我了解到许多对他们非常有益的制度和秩序；因而，我相信我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来到达某些目的，特别是通过比较的方法。例如，我要打比方说安静的时候，我会说：“他们比兄弟会修士们吃饭时还要安静”。因此，通过这一点儿经验所教会我的方法，人们能够引证出许多其他的事情。

在另一封他于1524年8月30日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件残篇中，马基雅维利说：

我一直待在、现在还待在乡间别墅里写这部历史，我愿意付十个索尔第——我不会出更高的价了——让你到我身边；那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写到哪里了；因为，在不得不涉及某些具体事件的时候，我需要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无论是歌颂还是贬损事件，我是否过分了。然而，我还是应该保持独立思考，努力做到公允客观，这样在我说出真相的时候，就没有人会抱怨了。

詹诺蒂记述了马基雅维利曾经对他说：^①

对于从科西莫掌权到洛伦佐去世这段时间的历史，我不能这样来写，就好像如果我没有任何顾虑的话我会写成的那样。那些事件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不会遗漏任何事情；只是，我不会说出，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什么手段和诡计，达到如此高的权力巅峰的。任何想要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可以很好地注意我通过他的反对者之口说出的东

① L. A. Ferrai, “Lettere inedite di Donato Giannotti,” *Atti del R.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ser. 6, 3 (1884-1885), 1582.

西，因为我自己不愿意说出来的话，我会让他的反对者说出，就像从我嘴里说出一样。^①

因此，通过第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似乎让事实胜于雄辩；通过第二段话，我们看到他或者夸大其词或者轻描淡写，先发制人地防止可能的抱怨；通过第三段话，我们看到他借助反对者的话间接地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马基雅维利不愿意奉承梅迪奇家族是因为他将德行置于权力和功名之上。对他而言，如果让他平静地不去探究那些伟大事件的原因，真实与奉承之间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们也不能这么说，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关注他自己的城邦是出于这样一个既是负责的又是爱国的愿望，即增进城邦的德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德行。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基雅维利对他的两位人文主义前辈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提出的责难，他们都是研究佛罗伦萨人民的历史学家。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说，他们是两位“极其优秀的历史学家”，并且在描述佛罗伦萨人所进行的战争方面“勤奋之至”。然而，他们在处理“国内动乱和内部纷争及其产生的影响”方面出了错。他们认为这些纷争过于琐碎，以及对它们的描述可能得罪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动乱揭示了佛罗伦萨的伟大之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诸如治国安邦这类具有崇高意义的事务中，对于当事人而言，无论他们如何处理，无论结果如何，似乎总是应该给予当事人更多的荣誉，而非指责”（序言）。在质朴的语言中，布鲁尼和波焦过高地估计了在决定荣誉时道德的力量；他们的历史著作在关于内部纷争方面尤显不足，这是由于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马基雅维利本人在《李维史论》中的论述：“如果想知道这些作家们秉笔直书时会如何评价恺撒，那么不妨看看他们是如何贬斥喀提林的，因为与他相比，恺撒更应该受到责备，因为喀提林不过是试图实施一桩恶行，而恺撒却已经完成了这桩恶行；还可以看看，他们对布鲁图斯予以多么高的赞颂，就好像由于不能责备恺撒，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他们就赞颂他的死敌”（第1卷第10章）。——译注

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错误：它在总体上影响了他们的著作，并且使得他们无法理解人类的野心和欲望，而这些正是人类与生俱来、永恒存在的东西。

尽管马基雅维利的许多方法同那些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如出一辙，但是，通过将他的建议立基于做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他从容不迫、毅然决然地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他在《君主论》第15章中也以同样的方法脱颖而出。）当我们阅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西塞罗的精神气息，尤其是会想起《论共和国》（他们并不知道这部著作^①）第二卷；在那里，西塞罗以精妙绝伦的反语和小心谨慎的责任，将他对自己共和国起源的叙述融合进关于最完美政体的那些特征的发展之中。这种历史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因为它假设自然同德行既是相互竞争又是相互合作的。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对西塞罗的评价并不高（尤其见《李维史论》第1卷52章），他不仅仅是自然或命运同德行之间竞争的观察者；他对政治的局限性不是像斯多葛派那样高贵地放弃而是被动地服从。对他而言，理论的目的和结果是为了扩展实践的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个“事业”，他将自己置于在他之前的全部传统的——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对立面，那个传统过分依赖于道德的力量。他从这个传统中借鉴的任何东西都被他用来反对它。

作为总结，我们可以简要地提出从马基雅维利引申出的结论。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没有接受历史事实的绝对性，他似乎确实提出了历史结果的绝对性。如果德行不是按照道德戒律起作用那样而是依据产生使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去理解的话，我们也许正在走向将事实绝对性和历史研究作为目标的道路。只要马基雅维利的结果是人类德行的产物，而他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伟大之处”，那么人们做了什么远比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更为重要。无论在道德上多么令人怀疑，马基雅维利独特的人文主义仍然存留了

① 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在中世纪一度佚失，直到19世纪初才重见天日。——译注